

刘周堂 著

前期儒家文化研究

前期儒家文化研究

前期儒家文化研究

前期儒家文化研究

前期儒家文化研究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前期儒家文化研究

刘周堂 著

责任编辑:肖启明

封面设计:牧云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邮政编码:541001

(广西桂林市中华路36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9.5 插页:2 字数:238千字

1998年3月第1版

1998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0001—2500册

ISBN 7-5633-2560-3/G·1859

定价:16.00元

序

黄 钊

儒家文化源远流长,在我国传统文化的历史长河中,占有无比重要的地位,对我们民族的政治、经济、道德、宗教乃至思维方式、生活习惯、民族风俗,产生过极其深远的历史影响,至今仍左右着我们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不能不引起我们的重视。

我国的传统文化发端于先秦时期,当时的诸子百家以多元互补的形式,程度不同地对它的形成和发展作出过奠基性的贡献。在诸子百家中,对我国传统文化影响最大者,司马谈归之为“六家”,班固《汉书》又总括为“九流十家”。其实,对我国文化产生过长远影响的学派,只有儒、墨、道、法四家。在这四家中,儒道两家居于前列。如《刘向·九流》所云:“道者玄化为本,儒者德教为宗。九流之中,二化为最。”所以,从总体上讲,我国传统文化乃是儒道两家文化的合流(东汉以后又增加了外来的佛教文化)。而儒道两家相较,又当以儒家文化为冠。诚然,道家文化以其旷达玄妙、气势清高显示出独到的优势;但就其对中国文化史的影响而言,仍然不及儒家。关于这一点,近年来随着传统文化热的兴起,我国学界多有所论。著名学者张岱年先生曾指出:“近人喜谈儒道互补,其

实儒家始终占主导地位”。^① 武汉大学刘纲纪教授也指出：“中国的传统文化基本上由儒、道、释三家组成，无疑，儒家处在主导地位。”^② 这些见解完全符合我国传统文化发展的客观实际。人所共知，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儒家学术一直处于“独尊”地位（秦代例外）。这种特殊的优惠待遇，为儒家文化得以发展准备了良好的历史条件。正是在这种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儒家之徒以“治国平天下”为己任，一代代“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游文于六艺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将儒家学术传播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其涵盖面之宽，思想内容之丰富，人文意识之浓郁，以及对民族精神影响之深刻，是我国历史上任何一种文化体系所不能比拟的。今天，随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日益发展，继承、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任务显得更加迫切。因此，整理、发掘我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的优秀成果，是历史赋予当代文化史工作者一项义不容辞的重大使命。这部《前期儒家文化研究》正是在这种使命感的推动下问世的。

刘周堂同志先后执教湖南师大和湛江师院，对祖国传统文化潜心研究有年，在道家文化和儒家文化领域，都达到了一定的造诣。这部书稿是他在儒家研究方面取得的又一最新成果。综观全书，作者对先秦至两汉宽阔视野上所展开的儒学源流，进行了多角度、多侧面、多层次的透视和探索。既揭示了从孔子到孟子再到荀子三位儒学先师思想体系承先启后发展演变的进程，又剖析了先秦儒学向两汉儒学转化的社会条件和历史动因，进而阐述了两汉儒学的表现形态和基本特征，比较全面地展示了前期儒家在政治思想、伦理观念、人生追求、价值取向等各个方面所作的理论思考和人文精神建树。在这些领域，作者以纵横驰骋的思绪和跨越上

① 《文化体系及其改造》，载《中国哲学史研究》1989年第3期。

② 《老子论纲》，载《江西社会科学》1989年第4期。

下数千年的宏观纵览,对前期儒家文化的丰硕成果和社会功能作了实事求是的评述,其中既吸纳了前修的研究成果,又勇发自己的独得之见,表现出追求真理、去伪存真的严谨治学态度。

先秦儒学向两汉儒学的转化,是新兴封建政权建立后营造新的上层建筑、选择适宜的指导思想的必然结果。秦和西汉王朝都建立于封建社会初期,它们对于用什么样的思想来指导封建政权的建设,尚无成熟的经验,因而需要一个探索的过程。这个过程从秦始皇起,直到汉武帝“独尊儒术”,才基本完成。秦王朝建立以后,坚持“以法为教,以吏为师”、“禁文书而酷刑法”,终于使秦政权短命而亡。这表明法家思想不能作为封建政权的指导思想。西汉王朝建立后,君臣接受秦王朝的教训,弃法从道,运用黄老思想作为治国安民的指导思想。这一是由于儒学经受了秦王朝“焚书坑儒”的血腥镇压之后,到汉初尚未恢复元气;二是由于长期的战乱,人心思安、思定,而道家“无为而治”有利于贯彻与民休息的政策,实现社会安定;三是由于道家学说到战国末年已完成向新道家的转化,它“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成为当时集百家学说为一体的思想体系,因而易于为各家所接受。可见,汉初的黄老之治,并非当时统治者臆想出来的,而是历史发展所使然。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各种矛盾的加剧,道家“无为而治”的指导原则愈来愈不能适应统治者政治上的需要。儒家思想经过汉初几十年时间的内炼休养,这时已恢复生机,完全可以走上政治舞台。汉武帝面临的藩镇割据和内忧外患的政治处境,迫切需要加强君主集权。董仲舒“独尊儒术”的主张,旨在改变当时“百家殊方”的社会现实,以达到“一统纪”、“明法度”的政治目的,这正好符合当权者的本意,因而理所当然地被武帝所采纳。刘周堂同志在本书中着力揭示“前期儒家的演进轨迹”,指出:前期儒家一方面始终坚持经世致用的原则,致力于推进理论和现实的结合,在切合政治人伦日用方面作了深入思考;另一方面又注意追求思想体系的精致和

完备,勇于采纳百家精华,使自己在内涵上不断从单一走向多元,具备了很强的应变能力。这些见解,新颖而中肯,可成一家之言。

儒家在政治上有着自己的鲜明特色。它所建构的仁政、德治、王道以及“家国一体”、“内圣外王”的思想体系,对我国历代封建政权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考察我国政治制度史,历代封建政权的建构模式和指导方针,无不基本上来自儒家。如封建宗法体系和大一统格局、君权至上的政治体制和君惠臣忠的君臣关系,以及重德轻刑的大政方针等等,无不是儒家设计而成的。它们对于强化封建专制、维护封建等级秩序,都起过重要的历史作用。虽然,从总体上讲,儒家政治学说中糟粕居多,但也不能忽视其中可贵的精华,如儒家提倡“为政以德”,要求当政者注重自身的道德修养,乃至把“修身”、“齐家”作为“治国平天下”的先决条件,倡导“贤人政治”风范;儒家提倡“天下为公”,强调当政者以天下国家为己任,“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儒家提倡“民为邦本”、“平政爱民”,关心民生,反对苛政,要求当政者办事公道,清正廉明,轻徭薄赋,宽刑减法,等等,都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统治者“无道”之行,迫使各级官吏采取一些“安民”的政治措施,注意改革弊政,务实求治,从而有利于缓和社会矛盾,推进社会的文明进步。这都说明儒家政治学说有其独到之处,值得重视。本书正是基于这一认识,对前期儒家学说作了系统的探讨,不仅揭示了儒家政治学说的内涵和特点,而且对其君民观、君臣观等,都作了深入剖析。其所论,持之有故,言之成理,发人深悟,表现了独立思考的可贵品格。

儒家道德是我国传统道德的主干。它所确立的仁、义、礼、智、信、忠、勇、孝、悌、慈、恭、宽、敏、惠等一系列道德规范,曾长期成为我国先民调节人与人相互关系的重要准则。毋庸讳言,在儒家道德体系中,也夹杂着许多封建糟粕,特别是“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三纲”说教,把君权、父权、夫权绝对化,严重束缚了人们的思想,导致了封建时代的蒙昧主义,扼杀了我们民族的智慧

和创造,这些到了今天,毫无疑问应给予批判。但是,也必须看到,在儒家道德体系中,保存着我们的祖先创造出来的许多绚丽夺目、闪闪发光的优秀道德成果,例如:“见利思义”、“以义制利”和“义以为上”的先义后利精神;“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人格独立精神;“仁者爱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人道主义精神;“自强不息”、“锲而不舍”、“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的艰苦奋斗精神;“厚德载物”、“宽人严己”、“虚怀若谷”的包容精神,等等,都是我们的祖先所倡导的高尚品格的结晶。它们如同一股水流不竭的圣泉,滋润着炎黄子孙的道德生活,启迪着中华儿女立身做人的伟大情操。这是一份无比宝贵的精神财富,值得我们代代相传,发扬光大。基于这一认识,刘周堂同志在本书中,对儒家道德的研讨,尤其用力。全书用较大的篇幅集中阐明了前期儒家“忧国忧民的政治参与意识”、“正道直行的大丈夫品格”、“严己宽人的人和观念”、“先义后利的价值取向”、“求是务实的处事态度”、“青史留名的人生追求”、“重德轻刑的政治方略”等鲜明特色,并专题论述了儒家的“人生哲学”,这些对于我们认识儒家道德的基本特征及其表现形态,探讨儒家道德的现实价值,都有着不可忽视的启迪意义,读后令人耳目一新。

刘周堂同志的这部书稿完成后,邀我为之作《序》。我读完书稿后喜不自禁,认为它是当前儒学研究中又一可喜收获,特提笔写了以上的读后感,是为《序》。

1997年11月22日于珞珈山“勤补书斋”

绪 论

儒学在中国现代化建设中究竟有无积极功能？它在构建未来中华民族的精神世界里究竟会处于一种什么样的地位？这是自八十年代初持续至今的有关传统文化反思的一个主要问题。在这场长达十几年的讨论中，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意见纷纭，莫衷一是。偏激者或以为效力于封建社会的儒学于当今中国有百害而无一利，应当彻底清除之，方可言中国的现代化；或以为儒学乃中华民族历史赖以绵延三千年而不曾中断的精神命脉，当今中国的种种社会弊病实乃儒学之不昌明所致，中国要实现现代化，非复兴儒学不可。未来中华民族的观念文化，亦必当是儒学的全面复兴。有些论者则对此加以调和，但在具体论述时，则又往往大而化之，给人以疏阔之感；或论而不确，使人有失望之憾。

儒学是个复杂而又完整的思想体系。说它复杂，是因为这个学派内部的主张并非完全一致，这不仅是因为早在战国时期就“儒分为八”，而且在它服务现实的漫长的历史实践中，随着历史阶段和服务方式的不同，儒学的形式和理论主张也不尽相同。先秦的原始儒学，两汉的经学，魏晋六朝以玄学形式出现的儒学，宋明的道学，明清时兼有实学特点的理学，以及近代以来融收了西学之长的新儒学，都在具体形态和思想内容上发生了或多或少的变化。说它完整，是因为这个学派尽管不同时期形态各异，代表人物主张有别，但都万变不离其宗，即都以“仁义、礼智、道德”为依归，都把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作为其人生哲学的宗旨，都主张积极入世，报效国家。儒学思想体系的复杂而又完整的特性，清楚地表明儒学具有很强的应变功能和主体融合功能，不同时期出现不同的儒学形态，说明儒学本身完全具有一种因时而变的自觉调节意识，这种调节意识的结果大大增强了儒学的适应性，从而使得儒学干预现实的功能具有超阶段的持久性和稳固性。另一方面，儒学虽代变不穷而又不离其宗的现实，说明儒学既长于因时而变，又善于吸取他家之长，以补己之短，具有恢宏大度的胸襟，但又始终坚持以我为主的学派原则。毋庸讳言，复杂而又完整的儒学体系中，既有阴阳五行观念，也有法家、道家的精华，更有佛学的教义。但他们在经过儒学的消化吸收之后，都已改名换姓，成为儒学家族的新成员，从而增强了儒学思想的竞争力和应变力。“变则通，通则久”，这是颠扑不破的真理，儒学的历史实践就充分证明了这一点。一个学派、一种思想体系，如果故步自封，不能代变，就不能为雄，就会走向灭亡，墨学的历史命运就是如此。只有积极主动地因时而变，才会有海纳百川的襟怀，也才能取精用宏、为我所用，永远立于不败之地。所以，与其说是借助王权的力量使得儒学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统治了中国封建社会两千余年，还不如说是儒学自身积极主动的因时而变的特性和可贵的以天下为己任的经世致用的理论主张赢得了思想意识领域里的独尊地位。撇开儒学内容的优劣暂且不论，单就儒学长期以来形成的应时而变和善取他人之长的特点，就足以说明，儒学在现代化建设中必定仍会焕发出勃勃生机。也完全可以预言，在构建未来中华民族的精神世界里，儒学必定仍会成为这个精神世界的主要成份。历史是不能割断的，观念文化的取舍也不是个人的主观愿望所能左右的，我们不能设想，一个哺育了中华民族三千年、且已占据中华民族心理结构的主导地位，并已融铸为中华民族精神的思想体系，会突然变得有百害而无一利；也不能设想，一个经历史实践证明能变化为雄、具有包容百

端的、开放的思想体系,在今天会寿终正寝,更不能设想要让骨子里都浸透了儒学思想意识的中华民族,完全洗心革面之后再从事现代化建设。近代民主思想先驱梁启超曾对此作过思考:“凡一国之能立于世界,必有其国民独具之特质,上自道德法律,下至风俗习惯文学美术,皆有一种独立之精神,祖父传之,子孙继之;然后群乃结,国乃成,斯实民族主义之根柢源泉也。我同胞能数千年立国于亚洲大陆,必有其所具特质,有宏大高尚完美,厘然异于异族者。吾人所当保存之而勿失坠也。”(《饮冰室合集》类编上,卷一《新民说·释新明之义》)这种立国之本的特质是什么,梁氏没有明言。我以为就是以儒学为主要成份所铸就的中华精神。正是这种以儒家思想为精髓的中华精神,使中华民族经受住了一次次内忧外患的严峻考验。当然,我们也完全有理由相信:这种世代形成的中华精神,也必然会促使中华民族顺利地从事现代化建设。世界上许多事例已经充分证明:现代化建设只能依据自己的国情,在弘扬自己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吸取世界各国之长来进行,决不可能丢掉自己赖以安身立命的民族传统文化而全盘照搬他人的做法。特别是在我们这样一个历史悠久、传统影响根深蒂固的国家里,更是只能如此。

儒家最根本的特点是主张积极入世,主张在改造现实、维护国家的利益中实现个人的人生价值。这是它区别于道家和佛教的根本点,也是它之所以能赢得全民族成员心理认同并历久不衰的根本原因。在儒家看来,人生在世,理当有所作为,于国家有所贡献:“士君子之处世也,贵能有益于物耳,不徒高谈虚论,左琴右书,以费人君之禄位也。”(颜之推《颜氏家训·涉务》)“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乃吾分内事耳!若不亲师友,汨没于流俗,驱而纳诸于罟获陷阱之中,而莫之知避,岂不可怜哉?”(《陆

九渊集》卷七，《书·邵中孚》）唯如此，儒家十分强调人应该在有限的生命内，奋发有为，以自己行动的实绩来延续生命的意义，而不至于使个体成为匆匆过客，死而无闻。因此，追求青史留名成了儒家人生哲学的一个重要标志，孔子自己就曾公开宣称：“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论语·卫灵公》）受儒家思想影响至深的三国吴人韦曜也认为：“君子耻当年而功不立，疾后世而名不称，故曰学如不及，犹恐失之。是以古之志士，悼年齿之流迈而惧名称之不立也。”（《三国志·吴书·王楼贺韦华传》）由此而形成并流传至今的“豹死留皮，人死留名”，“雁过留影，人过留声”，“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格言警句，几乎成了中华民族立身处世的生活准则，“流芳百世”是人们津津乐道、孜孜以求的终极目标，而“永垂不朽”则是中国人对逝者的最佳颂扬。如果说，留名意识的形成来自延续生命历程的强烈愿望，那么，英名永存的基石则必须建立在有益于国家的奋斗实绩上，这就是儒家屡屡教人积极建功立业的原因。翻开儒家的典籍，这类言语触目皆是，阅读古圣先贤遗作，每每使人热血沸腾，壮志凌云。所谓“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论语·泰伯》），“男儿生世间，及壮当封侯”（杜甫《后出塞五首》），“丈夫五十功未立，提刀独立顾八荒”（陆游《金错刀行》），“儒之为贵者，能定乱除暴，安百姓也”（唐甄《潜书·辨儒》）。值得指出的是，儒家所积极提倡的建功立业，青史留名，并不是完全来自一种封妻荫子、光宗耀祖的内驱力，更不是来自对于锦衣玉食的庸俗追求，而主要是植根于忧国忧民所生发的一种使命感和责任感，正如陈亮所说：“除天下之患，安天下之民，皆吾之责也”（《陈亮集》卷六《酌古论·吕蒙》）。

忧国忧民，这是儒家的光荣传统，亦是儒家积极进取的重要特征。早在《周易》《尚书》《诗经》中就充满着忧患意识，他们或忧王之不明，或忧臣之不忠；或忧天下之将倾，或忧百姓之饥寒，这种肇始于《周易》《尚书》《诗经》中的来自社会剧变的忧患意识，无疑对

于“言必称尧舜”的孔孟来说具有巨大的影响。孔子为鲁国前途担忧而寝食不安，更为天下四分五裂而痛心疾首，孟子因忧天下一统不能以王道而奔走呼号，贾谊因汉帝国措于薪火之上而君王不察忧心如焚，朱熹因君主未能诚心正意以治国而多忧叹之辞。在儒学的熏陶下，以忧国忧民为主的忧患意识成了中华民族精神世界的重要组成部份。这种思想意识在封建社会里，主要通过广大的士大夫和一般的知识分子表现出来，从曹植的“闲居非吾志，甘心赴国忧”，到秋瑾的“浊酒难消忧国泪”，都非常鲜明地表现出这一特点，正如杨慎所说“万民有乐，吾心何忧？”

忧国不是人与生俱来的一种本能，它来自个人对国家深沉执著的爱，与爱国是一对紧密相依的孪生姐妹，爱国情感是忧国意识萌发而又持久的内在因素，忧国意识则是爱国情感外化在个体身上的一种具体表现形式。无爱国之情，忧国意识无从产生，即使偶而萌发，也不过是昙花一现，转瞬即逝。正如梁启超在《忧国与爱国》一文中所说：“吾愈益忧之，则愈益爱之；愈益爱之，则愈益忧之。”爱与忧相辅相成。儒学所蕴含的强烈的忧患意识，正是植根于对生我养我的祖国的炽烈的爱。“指九天以为正兮，夫唯灵修之故也。”（屈原语）“臣心一片磁针石，不指南方誓不休”（文天祥语），在这里，忧患意识和爱国情感紧紧地结合在一起。

儒学既倡导忧国忧民，更注重把这种忧患意识化作爱国爱民的具体行动，以自己的实绩来消解忧患的存在，以脚踏实地的事功来展现爱国爱民的高尚情怀，而建功立业就是将上述二者统一起来的最佳解决方式。至此，儒学积极进取的特点在——青史留名——忧国爱民——建功立业的循环进程中得到充分的体现。历代的仁人志士就是沿着这条轨道走过来的，中华民族发展壮大历史，也就是在这种积极进取的儒学指导之下写成的，它构成了中华民族人生哲学的主旋律。

这种以忧国爱民为基础，以建功立业为手段，以青史留名为终

极目标的儒学精神,与现代化建设所要求的思想意识是完全一致的。要把我们这样一个人口众多,底子薄弱的大国建设成为现代化的强国,需要付出巨大的努力。它既需要当今的中国人具有强烈的忧患意识和高尚的爱国情怀,更需要人人都有在这场伟大的社会改造活动中建立丰功伟绩的雄心壮志。只有建设的主体者们个个斗志昂扬,人人精神饱满,以极大的热情和高昂的斗志全身心地投入现代化建设中来,形成一种你追我赶、当仁不让的积极进取的社会风气,现代化建设才能实现预期的目标。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是一项巨大的系统工程,是前无古人的开创性的工作,如果没有高昂的民族精神,没有亿万人民的满腔热情的投入,没有忧国忧民的紧迫感,没有建功立业的进取精神,没有身体力行的参予意识,现代化建设则会成为一句空话。而现代化建设所需要的这种民族精神,就蕴含在中华民族的传统思想意识里,这就是数千年来在儒学思想熏陶下所形成的中国人重建功立业、尚青史留名的人生价值取向。我们只要对人民群众中所蕴藏的这种宝贵的思想意识加以正确的引导,就会变成促进现代化建设的巨大的精神力量。

二

儒学特别注重个人道德品质的自我修炼,修炼的终极目标是造就光辉峻洁的理想人格。这种理想人格主要表现为“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的品德。由此出发,在中国历史上形成了安贫乐道、重义轻利和重气节、敢与邪恶势力进行顽强抗争的光荣传统。现分别加以论述:

关于前者,儒家学者不仅有着充分的理论论述,而且也是这样身体力行的。孔子有曲肱饮水之乐,颜子有陋巷箪瓢之乐,曾点有洛沂咏归之乐,曾参有履穿肘见、歌若金石之乐,孟子有道德胜于王者之乐,周、程有爱莲观草、弄月吟风、望月随柳之乐,无处无时而不心神怡乐。这种超时超地的心神怡乐当然不是来自粗茶淡

饭、鞋破衣烂的穷快活，更不是摆脱人世烦恼而进入物我两忘的精神之乐，而是源于高尚的道德信念和理想的执著追求产生的得道之乐。所谓“朝闻道，夕死可矣”，就道出了此中的真谛。道是什么？“非天之道，非地之道，人之所以道也，君子之所道也。”（《荀子·儒效》）如前所说，儒家关注的是人道，“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论”，人道的具体内涵是“礼义辞让忠信”（《荀子·强国》），表现在个人身上，就是道德高尚的谦谦君子，外化为社会现实，就是由礼所生发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纲常秩序和由仁所生发的“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的仁政王道理想。可以说，儒学的核心就是对这种充满伦理色彩的、以个人的道德完善和社会的安宁和平为主要内容的人道的追求和把握，正是把这种人道作为自己立身处世的崇高目标，所以历代服膺儒学的士大夫们才能那样自觉地刻苦自励，淡泊世俗的名利观念，摆脱凡人的物欲追求，一日“三省吾身”，时时不忘省察克治之功，朝着理想人格的目标不懈地迈进。也正是对于这种人道在宇宙广泛流行的执著追求，孔孟虽然在周游列国中惶惶若丧家之犬，甚至在“粮绝，从者病，莫能兴”的困厄中，在遭受齐王冷遇和别人的嫉妒陷害时，他们仍以“君子忧道不忧贫”和“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来强化内心信念的追求。当这种对“道”的追求占据了个人的整个精神世界时，就“贫穷贵贱不动其心”（陈亮语），确乎不拔，浩然自守。所以荀子说：“志意修则骄富贵，道义重则轻王公，内省而外物轻矣。”（《荀子·修身》）这样，儒家重义轻利的口号也就有了扎实的理论根基和切实可行的实践依据，这也是儒家重义轻利的理论之所以具有超时代的稳定价值的根源所在。

特别值得指出的是，儒家并不把安贫作为乐道的必然条件，这与墨子那种主动以近乎苦行僧的方式来追求理想的实现是不同的。在儒家看来，乐道不一定要安于贫贱，只要对于“道”的追求不是勉强的虚与委蛇，而是出自内心的自觉要求，那么“富贵也能乐

道”，所谓“富贵不能淫”就是这个道理。但是没有安于贫贱的思想准备和坚定意志，自然不能坚持对道的持久追求，也不会有追求道的快乐体验。同理，儒家并不一概盲目地反对利益的追求，相反，他们正是国家大利的执著追求者。他们要求统治者勤政爱民，要求平民百姓日修其德，谨身从命；要求统治者在稳定的前提下变革旧制，都是着眼于国家长治久安的大利。同样，在奸臣弄权，民不聊生，遭受外族侵略，国破家亡的紧要关头，儒家力主“从道不从君，从义不从父”（荀子语）。要求仁人志士“杀身以成仁，无求生以害仁”，可见，儒家反对的只是不顾道义的私利，“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因此，我们只能说儒家具有明显的重义轻利的倾向，但决不能说他们是重义弃利的清教徒。至于儒家把“利”作为万恶之源，也是在把它与道作为一对矛盾的背景下而言的，仍然具有它的合理性。离开道义的制约，专门只讲利益的多少，那必然会导致物欲横流，人格毁灭。正如孟子所说：“为人臣者怀利以事其君，为人子者怀利以事其父，为人弟者怀利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终去仁义，怀利以相接，然而不亡者，未之有也。”（《孟子·告子下》）现在，社会上出现的欺诈哄骗、偷漏国家税收等一系列的唯利是图行为，之所以屡禁不止，就是因为人们心理上的道德防线崩溃了，民族的道德意识淡薄了，整个社会未能建立起有效的道德激励机制和道德制约机制，甚至连最起码的道德评判也出现了危机。道德失去了它应有的干预现实的功能。其所以如此，是由于前些年在引进西方价值观念的同时对传统道德进行了不适当的批判，因而使得人们在道德问题上，在义利关系上陷入了迷惘，甚至出现了严重的信仰危机和道德观念的错位，致使许多非道德的、反道德的行为和观念泛滥成灾。无数的历史事实证明：当一个人失去了道义上的追求时，是难免要成为金钱的奴隶的。当全民的道德水平在下降时，人的物化就成为必然。这就是之所以许多人在市场经济中屡屡见利忘义、不惜以身试法的内在思想根

源。因此,在市场经济迅猛发展的今天,在物质欲望不时猛烈地敲击着人们的思想提防的时候,重申孟子的“非其义也,非其道也,禄之以天下,弗顾也;系马千驷,弗视也。非其义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以与人,一介不以取诸人。”(《孟子·万章上》)实在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他不仅可以提高人们的道德水平,提高防腐拒蚀的自觉性,而且可以净化环境,促进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

关于后者,在儒学思想的影响下,更是形成了一个令人自豪的一脉相传的好传统。孔子明言,“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论语·子罕》)孟子则说:“以顺为正,妾妇之道也。”(《孟子·滕文公上》)荀子主张“虽天子三公问正,以是非对。”(《荀子·大略》)保持自己的独立人格,坚持自己的理想追求,肯定自己的是非评判,任何情况下都不因环境的压迫和利益的冲击而改变自己的节操,这种独立特达的人格在中国封建社会里,主要表现为不仕无道之世和对恶势力的坚决抗争。出仕为官是儒家积极主张的,也是封建社会里实现个人抱负的主要途径。但是“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自从孔子带头实践之后,即成了一条不可违反的祖训,否则,不仅为儒家所不容,也会遭到社会舆论的谴责。扬雄本是“不汲汲于富贵,不戚戚于贫贱”的正人君子,但因为涉嫌为王莽唱过赞歌,即遭世人白眼。五代时期的冯道无士节之志,随世俯仰,以保禄位,颇为时人所轻。至于钱谦益、吴梅村等人虽然是被迫仕清,但仍有节亏之嫌。不仅时人作如是观,就是他们自己内心也常常怀有一种愧对汉邦的深深的内疚。而李白、陶渊明等人之所以长期以来受到人们的尊重,固然与他们的文学创作有关,但恐怕最主要的还是他们那“志节傲青云”的光辉人格征服了人们的心。中国人之所以喜欢梅花、竹子、松树,并不是因为这些东西在形态上有什么特别引人注目的审美魅力,而主要是因为它们是峥嵘挺立、刚直坚强的人格象征。儒学认为这种人格力量可使贫夫廉,懦夫立。

对于邪恶势力，儒家主张与之进行坚决的斗争，但斗争的方式却可以多种多样。如果说孔子的“以道事君，不可则止”，以及由此发展成不与恶势力同流合污，还是一种消极反抗的话，那么从孟子开始的对于暴君主张“反复之而不听，则去之”，以及由此发展的敢把皇帝拉下马的做法，则是对于恶势力的一种勇敢的抗争。

西汉时的朱云，当面斥责权臣，致使龙颜大怒，在被拉出斩首的情况下，仍然手攀栏杆大骂君昏臣奸，这一为了是非曲直不顾生死的英雄气概终于感动了正在盛怒之下的君王。在中国封建社会里，正直人士最瞧不起宦官，因为这些人为了谋得一官半职不惜以人的尊严为代价，所以每当宦官专权时，人们好象受到了极大的耻辱，而宦官专权之时，往往也是社会最黑暗的时期，中国历史上，有两次宦官专权，一次是在东汉中、后期，一次是在明末。曾巩和方苞回顾当时情况时说：

汉之兴以后，政出宦官，小人挟其威福，相煽为恶，中材顾望，不知所为。汉既失其操柄，纪纲大坏。然在位公卿大夫，多豪杰特起之士，相与发愤同心，直言正指，分别是非白黑，不少屈其意，至于不容，而织罗党之狱起，其执弥坚，而行弥励，志虽不就而忠有余。故及其既歿，而汉亦以亡。当是之时，天下闻其风，慕其义者，人人感慨奋激，至于解印绶，弃家族，骨肉相勉，趋死而不避。百余年间，擅强大，覬非望者相属，皆逡巡而不敢发。汉能以亡为存，盖其力也。

（《曾巩集》卷一九《徐孺子祠堂记》）

士大夫敦尚气节，东汉以来，惟前明为盛。居官而致富厚，则朝士避之若浼，乡里皆以为羞。至论大事，击权奸，大臣多以去就争，台谏之官，朝受廷杖，谏疏夕具，连名继进。至魏忠贤播恶，至公卿以及殿官，甘流窜，捐腰领，受锥凿炮烙之毒而不悔者，踵相连也。

（《方苞集·集外文》卷二《请矫除积习兴起人才札子》）